

出生廣州的汪彼得牧師

翁傳鏗

汪彼得牧師為廣東新會人，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生於基督化家庭，背景為美瑞丹會（即今之播道會，原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成員，後來因基督教與社會的理念不同而和諧地退會。）可見，他因出生於基督化家庭，自幼篤信上帝。中學畢業後，往廣州協和神學院攻讀，一九三七至一九三九年赴美深造宗教教育（入讀美國奧柏林神學院〔Oberlin Theological Seminary〕），期間曾赴巴黎參加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World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會議。為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派赴海外留學第一人。一九四零年學成歸來，各方面爭相羅致，牧師不為所動，決心與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共赴國難，擔任執行幹事職，一九四零年在香港九龍佑寧堂受按為牧師。時值抗戰，人力物力俱感缺乏，牧師努力工作，沉着調度，一九四七年參與善後救濟處，致力重建家國，一九四八年底擔任廣東協會總幹事，至於牧養堂會則為一九四七年九月起兼任仁濟堂主任，直至一九五一年因廣東協會改組（不設總幹事而成立五人專責小組）改任仁濟堂全職主任牧師。

一九五六年來港，初任第六區會代區幹牧，為利便教會發展，乃議訂憲章，改組為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向政府註冊為獨立法

團，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依章職銜正名為區會總幹事。斯時大量內地人士移居香港，汪牧師認為乃推展教會聖工大好時機，故一方面發動會眾，也與西國合作教會磋商，籌建禮拜堂及學校，數年間莊嚴聖殿，宏偉校舍，紛紛矗立於港九新界各區，事工擴展神速。一九六九年，英廷以牧師協助普及教育，頒授 MBE 勳銜。一九八零年在汪牧師不斷努力耕耘，開拓財經，令教會經濟穩定，遂於一九八零年宣告區會為自養、自治及自傳的教會。時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倡導開展關懷中國事工，成為中港重要橋樑。在穩定之中汪牧師於一九八四年一月一日起榮休轉任區會主席，至五月十五日主懷安息。¹

44 汪彼得牧師多次在中華基督教會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書，提及感謝上帝的看顧與帶引，他全家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從中國大陸到香港，轉移新的工作崗位——一九五七年四月六日任代區幹牧，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日因應同年八月一日憲章施行正名總幹事。²

事實上，汪牧師早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五日以特約代表身

1 此段內容，根據〈汪彼得牧師安息禮拜儀節〉，羅福華弟兄口述及李貞明，〈悼念彼得牧兄〉，《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326-327期（1984年7月15日），頁9。

2 中華基督教會執行委員會會議紀錄。

分出席年會，並引用撒迦利亞書二章一至十三節為中心教訓，旨在「表達上帝的計畫」乃沒有城牆的耶路撒冷：「因為耶路撒冷不應是一個堡壘，而是一個沒有城牆的城，人口眾多，物產豐富的地方。這才是安全、幸福與快樂的地方。這種道理幫助了我們認識到一個沒有城牆的世界才是安全。」這正是上帝的計畫勝過人的計畫。所以「我們要全力支持普世教會運動，通過這項工作，加強人類間的互相諒解，把一切在我們之間、教會之間、國與國之間、種族與種族之間的這些圍牆內的偏見，自私與憎恨消除。」³及至八十年代，汪牧師在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的演講仍以沒有城牆的香港，來強調撒迦利亞先知的洞見，並藉此提醒我們八十年代的香港，「亦不可能受限制、被孤立，更不可能固守與排擠，香港應是一個沒有城牆，內外不受阻隔的開放城市。」他透過這個歷久常新的經驗，幫助香港教會面對社會急劇的轉變，特別是在香港前景未明朗的情況下，鼓勵我們「與中國文化認同，向中國同胞認同，他們才能站在中國同胞中傳道服務，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⁴

從兩篇同一意念而在不同時代宣講的適切性講章，也可以幫助我們看到汪牧師的教會事奉方向，永遠是無牆的，社會範疇一直是

3 汪彼得，〈上帝的計劃：沒有城牆的耶路撒冷〉，《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創刊號（1957年6月2日），頁1-3。

4 汪彼得，〈八十年代的香港教會〉，《信息》（1981年1月）。

他所關注的。所以，汪牧師上任首三年，首先整頓區會在新界開辦的五所津貼小學（全完小學、元朗真光小學、拔臣小學、大澳小學及正而小學。）並展望能「提高信徒的社會意識」，讓他們明白教會「有責任協助建立一個更美好的社會，我們更應有分享的精神，把我們能給予的分擔社會大眾的需求，或許我們所做的是微小，但只要我們是照着主教訓去行。」⁵接着於一九五八年回應戰後的兒童失學問題，支持香港政府的七年小學教育發展計畫，開始着手建立全完二校以及全完一校和拔臣學校的新校舍，此外進行元朗真光學校、大澳學校與大埔正而學校的加建。協助有關中學：培英中學、九龍真光中學及英華書院建立新校舍。⁶一九五九年為響應世界難民年，推行基督徒社會責任年，除了加強培育信徒的社會意識，更設立了社會福利部，主辦家庭福利院、天台學校、福利站、徙置區學校（第一所為黃大仙的基聯小學）及汽車機械訓練班（本來計畫於老虎岩建立校舍，惜未能成功，但卻成為後來實用中學或職業先修學校的濫觴。）並計畫於官塘及荃灣推動工人工作。⁷

經過了幾年的揣摩與投入重建社會，汪牧師於一九六零年確立

5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五七年度的事工與今後的展望》，頁3、8。

6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五八年度事工報告書》，頁3-4。

7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五九年度事工報告書》，頁2-5。

建堂原則與政策：「每建一所學校，必同時計畫有聖堂，更可能包括有社會福利中心。」雖然好像有三方面事工，但目的就是宣傳福音。所以制訂了四年事工建設計畫，在四所新堂（梅窩堂、元朗堂、全完堂及長老堂）落成的基礎下，繼續建立三所聖堂（黃大仙錦江紀念禮拜堂、官塘梁發紀念禮拜堂及深水埗深愛堂）。學校方面則有九所（橫頭磡基英小學、粉嶺基新工業中學、黃大仙基協實用中學、大窩口全完三校、深水埗基真小學、東頭村基聖小學、彩虹邨基華小學、深水埗銘賢中學及銅鑼灣桂華山中學）。還有英華女校擴建。⁸

一九六一年回應香港人口調查，決定繼續興辦小學，以幫助十二萬失學兒童；推動實用中學來回應二萬人失業。那是由於自四九年至六一年，有八十萬人從內地來港，造成種種社會問題，社會服務部決意集中辦理兒童福利（培育兒童計畫）、工人服務、社會教育，與托兒所的工作。⁹面對如斯重大的責任，以及區會十年自養政策的挑戰，汪牧師於一九六二年的周年代表大會提出「共同使命聯合運動」：「我們的共同使命就是傳道服務，共同行動就是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兼顧別人的事，聯合就是力量。」¹⁰在這基礎

8 汪彼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六零年度事工報告書》，頁4-6。

9 汪彼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六一年度事工報告書》，頁2-3、10。

10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一九六二至一九六三年度事工報告》，頁12。

下，汪牧師於一九六六年提出「十年發展計畫」：重視「四年鞏固更新，十年加強更新發展。」為重點，以「緊靠基督，深入世界，再進十年，加強發展。」為方向。主要事工是為貫徹透過學校傳道服務的工作原則，擬答應政府的邀請，協助解決社會需要，繼續籌建中學八間及小學兩間。至於社會服務限於經費（特別是外國教會資助減少），故發展暫緩，由因應難民需要而急促發展的事工，改為以支援及訓練為主。¹¹

一九七二年九月至一九七三年八月，擴闊香港政府「清潔香港」的範圍而推行「清潔香港運動」，涵蓋層面包括環境、思想及生活，使信仰價值與現實生活結合。¹²

由於教育的急促發展，政府與文憑教師於一九七三年產生爭執，甚至罷課，汪牧師聯同聖公會白約翰會督及天主教徐誠斌主教居中協調，發揮神職人員促進和平的天職，使事情得到平息。¹³ 他們對社會衝突採取的角色，或許能對現今香港社會的爭議不已，帶來啟迪。

11 汪彼得，《總幹事的話》，（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1983），頁450、455-456。

12 翁傳鏗編，《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九十周年紀念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2008），頁33-35。

13 《天主教香港教區牧函集（1969-1975）》，（香港：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2007），頁146-152。

一九七九年為了響應國際兒童年，發展照顧弱能兒童而興辦特殊教育，倡議建立念慈中學及基順學校。¹⁴

綜觀汪彼得牧師領導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二十六年，建立新禮拜堂十間，另有購買普通樓宇或利用學校禮堂設立的禮拜堂五間。至於學校方面則有六間中學，新建十三間中學和小學三十九間。¹⁵ 早年對香港的貢獻，在於回應重建戰後社會以及解決難民問題，七十年代則着重回應社會的優化，如清潔運動及照顧弱能，及至八十年代出現前途危機，他倡議「我愛香港運動」，甚至認同中國的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但卻沒有停留在狹隘的民族主義，故最後提出「傳揚耶穌，天下一家，主旨必成。」並以向貧窮人傳福音作為教會的永久宣教方向。

綜觀汪牧師從一九五七年擔任總幹事至一九八零年二十多年間，他絕少涉及政治，那麼更難明顯地表達愛國情懷。那是基於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香港乃處於冷戰夾縫之中，即使七十年代的香港基督教協進會舉行教會諮詢會議，邀請港督戴麟趾致詞，他也一再強調，教會應「多談宗教，少談政治。」¹⁶ 無怪乎他於一九七九

14 汪彼得，《一九七八年度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書》，頁14、16。

15 汪彼得，《一九八零年度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書》，頁13-14。

16 據前輩牧者口述得悉。

年底計畫關懷中國大陸教會時，便開宗明義說明「我首先聲明本會絕不涉及政治關係。」¹⁷不過汪牧師心底裏是充滿愛國情懷的，如早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他在會訊撰寫了〈工作修養〉提及「外國生活方式雖然令人嚮往，但我有着抉擇而不致變成外國化，才能適應在中國教會工作。」¹⁸

一九八零年隨着港督麥理浩訪華，帶來社會不安，汪牧師推動「我愛香港運動」：「鼓勵青少年熱愛耶穌，實行祂的教訓，進而愛家庭、孝敬父母、愛護學校，專心求學，將來獻身服務本港社會。」¹⁹期望「大家都能和平共處，彼此尊重；沒有種族的歧視，沒有膚色的排擠。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香港既能保存中國固有的文化，又能促進中西文化的交流，蔚為世界各地人士所醉心嚮往的地方。」²⁰可見整個運動雖然倡導愛港，但也告知國人不要忘本。

隨着中國改革開放，教會重開。汪牧師一方面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零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施政總幹事報告提出關懷中國大陸教會，他首先肯定三自愛國運動已建立成為中國人的教會，他

17 中華基督教會《一九七九至一九八零年度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總幹事施政報告》。

18 汪彼得，〈工作修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18期（1975年7月1日）。

19 汪彼得，《一九七九年度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書》，頁9。

20 「我愛香港」運動宣言，《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73期。

甚至認為中國教會已經達致中華基督教會的創會精神。基於自治自養自傳的互相尊重精神，如果政府准許，願意出於愛心捐獻，以助印刷聖經、聖詩及修理教堂，另外中華基督教會在廣州的學校，如真光、培英及協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校具及圖書毀壞淨盡，校舍失修，學校極需資源幫助。最迫切的是需要購置實驗儀器及圖書，雖然這些學校改了名（現在已先後復名及沿用原來的校訓），亦不再是教會辦理的學校，但唯一相同的是教會創辦這些學校的目的，都是要培育中國青年。²¹

另一方面汪牧師也反映世界傳道會執行委員研討「有關對中國肢體關懷與責任問題」，決意加深對中國及中國基督徒的認識；鼓勵會員教會（尤其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在可能範圍內與中國教會接觸，從而了解實況，不宜參與任何地下工作或組織；不宜計畫差派傳教士入中國；如中國教會要求支持當會積極反應；盡量與其他教會合作而不應採取宗派性行動以及本愛心堅忍多代禱。²²

汪牧師深感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既已達成自養，故於一九八零年度周年代表大會正式宣告為「三自的教會」，並成立港幣二百萬

21. 同上。

22.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72期，頁4。

元的三自專款，用作協助港外教會（包括中國大陸教會與台灣教會及世界傳道會會員教會）推行教會自治、自養及自傳工作。²³他在研討會以〈四十年來我對教會「三自」的體會〉為題，呼籲信徒以耶穌接受施洗約翰為榜樣，發揮與人民認同的精神，「與中國文化認同，向中國人民認同，教會才能站在人民中傳道服務。這樣的教會才能自信落實，自尊持守，發揮教會功能，達成主耶穌託付我們的任務。」²⁴同時他也希望抱着捨異求同的精神，向中國大陸教會的三自運動認同，消除彼此的隔膜，願意與內地教會肢體加強聯繫，只要一切為耶穌，一切為教會，互相關懷，彼此代禱，亦可說是宣告為「三自教會」的另一個原因。²⁵

52 一九八一年的事工重點分為兩方面：首先是響應國際弱能人士年倡議向貧窮人傳福音（關懷貧窮，照顧弱能，服務老年）；另一方面是回應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紀念倡議學習中國文化，用以加強民族意識及愛國精神。²⁶主要內容包括——1) 籌建國父孫中山紀念禮拜堂（建於上水堂內，最接近內地的堂會），使本港人士不忘辛亥革命

23 汪彼得，〈今年的區會主日〉，《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31期，頁2。

24 汪彼得，〈四十年來我對教會「三自」的體會〉，《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84期，頁3。

25 汪彼得，《總幹事的話》，（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1983），頁285。

26 汪彼得，《一九八一年度周年代表大會總幹事報告書》，頁13、18。

的成就，同時，讓國人知道，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港期間，在本會公理堂受洗為基督徒。2) 舉行中國文化專題，邀請何世明牧師擔任主講。3) 周年代表大會開會儀式改作紀念儀式，以「團結中華民族」。邀請龐德明主教專題演講「國民革命與教育革命」。4) 推行國語運動，先從小學四、五及六年級中文科用一節國語會話，翌年九月推展至中學。²⁷ 但他並沒有提倡狹隘的民族觀念，故於一九八二年提出以「傳揚耶穌，天下一家，主旨必成。」為事工中心。²⁸

尤為難得的是一九七九年中國教會重開，汪彼得牧師時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他倡導邀請中國基督教代表團於一九八一年三月訪港，使中斷來往三十年的中港教會重新建立關係，並於同年九月汪牧師以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身分率團訪問內地，他到了廣州憶及舊日趣事，大家便欣然不惜辭令，再看他那種歡懷的樣子，就像多年的遊子回到故鄉。²⁹ 可見汪牧師在八十年代初不只在自己教會推展關懷中國事工，更領導香港教會燃起關懷祖國情懷。

27 〈區會動態〉，《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會訊》，第290-291期，頁15。

28 汪彼得，《總幹事的話》，（香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1983），頁483。

29 《信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第39、43期。